

陆航的直升机专家李伟是个传奇人物。1989年4月1日，陆航在西藏执行任务的张崇海机组，从林芝起飞后，与部队失去联系。因为是在边境地区飞行，所以，失事飞机是否在国内，还是个未知数。

到5月底，近两个月的空中、地面、军方、地方综合搜寻，都没有任何新的发现。航空搜寻工作被迫暂时告一段落，李伟和陆航基地王德荣司令员一行回到了成都。正当他们准备返回北京时，又接到上级通知，要求他们暂缓回京，留在成都待命。

6月下旬有消息传来，猎人在多雄拉山口南部发现了直升飞机残骸，陆航和成都军区即刻派李伟和军区陆航处鲁参谋赶赴西藏。那天早晨天刚蒙蒙亮，他们就坐着摘掉了军车牌照的吉普车，赶到双流机场乘机。

做好了一切必要的准备工作之后，王司令员带着二团的邢喜贵团长、国逢仁副参谋长、罗国富处长，机关的冯蒂凯、刘建军、李伟，以及灵芝军分区作战科冉科长和几个侦察员，机降到事故现场附近的山脚下，开始勘察事故现场、搜寻遇难人员遗体。

这里的积雪尚未全部化尽，但是高大浓密的灌木丛已经全部显现眼前。4月初李伟和他的伙伴们来到这里时，这些灌木丛全都埋在积雪下，到处都是白茫茫的一片，分外素洁。可是这会儿，灌木丛枝头上却挂着事故的残片和衣服的碎块及纤维物，在风中悲戚地晃动不停。凄惨狼藉的现场明确地告诉人们：在事故发生的一瞬间，张崇海、巴古泽旺、刘家强、唐孝德4位同志就已遇难。

事故残骸分布的宽度比较有限，随着山坡向山顶延伸，呈长条状。李伟和战友们 在树丛下的雪地里仔细地搜寻，并且把遗体的碎块小心地背到山下。现场勘查搜索结束以后，李伟和同志们认真、细致地对尸块做了辨认，然后分别把他们临时掩埋在雪地里。

高原雪山上的天气变化很快，刚才还是蓝色的天空，转眼间就布满了云，云层好像故意作对似的，紧紧捂住了山顶。按计划来接他们的直升机，在云上盘旋了一阵子，最后只好返航了。望着偏西的太阳和距离他们也就两三公里的多雄拉山口，王司令员说：“这天气，不能等飞机啦，咱们徒步翻山回去吧。”大家便沿着羊肠小道开始向山顶进发。侦察兵出身的冉科长长期工作在林芝军分区，经验十分丰富，他悄悄拉了拉李伟：“这个时间翻山，肯定过不去，我们会全部冻死在山上。”李伟相信冉科长的话，赶忙和那团长商量对策。他们快步走上走在队伍最前面的王司令员，申明了理由，提出了建议。冉科长也向司令员介绍了以往的经验教训。王司令员听后，毫不迟疑地决定：就地宿营，明日天亮以后再行动！

在一块突兀上扬的火岩石上，李伟一行安顿了下来。虽然是夏天，但晚上依然挺冷，他们只好燃起了火堆。可是，这次野外露营最不好应付的不是寒冷，而是那些成群结队乱飞、迎头捣乱的小蠹虫。它们是死皮赖脸往头发里钻，往脸上扑，被叮咬的地方又痛又痒，难以忍受。为了应付这些小蠹虫，他们只好尽量多往火堆上添加湿树枝，把大火变成烟，用烟来驱赶小蠹虫。虽然得承受着烟的熏呛，但这总比被蠹

■现场

多雄拉山口的雄鹰

□郑恩波

虫咬要好一些，直到后半夜，气温降得很低，这群不速之客才不见了踪影。

早上9点多钟，李伟和同志们终于听到了黑鹰直升机飞临他们上空的隆隆声，陆航办公室主任曹天臣将军亲自随机赶到现场上空，通过电台问候了大家。曹将军说：“我身边有吃的，还有用的，就是专门给你们送来的，可我们是在6000米以上，全是云，下去不去呀！”王司令员高兴地回答说：“谢谢首长关心，我们翻山回去，飞机到排点接我们吧！”

收拾好行装，大家抖擞起精神向山脚进发了。到了山脚下，仰头望着面前陡峭的冰大板，不禁让人倒吸了一口凉气，光秃秃的冰壳散发着森森的白光，根本就找不到任何路的痕迹。大家稳下神来，喝口水运运气，做爬山的最后准备。李伟和邢团长商量后，排定了行军序列：冉科长带两个战士在前面开路，邢团长、国副参谋长带两个战士护卫着王司令紧随其后，冯蒂凯和李伟殿后，刘建军、罗国富等夹在其中。

军分区的冉科长有丰富的登山经验和过硬的身体素质，对这一带的地形环境非常熟悉，李伟非常佩服他。一路上，没有他在前引领，大家根本就不知道怎么走、往哪走。爬冰大板时，如果没有他在前边挖窝开道，大家几乎就不可能爬上去，说不定还会酿成又一个重大事故。而李伟呢，背着一支半自动步枪走在队伍的最后，刚上路时并没觉得背上的枪有多沉，可是走了一段，便越走越觉得沉重，两只脚迈起来就没有那么轻松了。李伟事后在日记里这样写道：“说实在的，这要是我私人的物品，哪怕它再值钱，我也会毫不可惜地扔掉它。可这是枪啊！它不属于我个人，我在，它就必须和我同在。”

终于爬上了第一个平台，有那么20多米是相对平坦的，起码可以站直了走路。再往前是一条4米多宽的溪流，过了这条溪流，就又得爬山了。这条溪流与我们日常概念中的小溪，可完全不是一回事，它没有温柔可爱可言，冷酷和危险时时存在。它的上游是从厚厚的陡峭雪层下涌流出来的清澈雪水，形成一个4米多长、2米多高的小瀑布，直接冲打在不足一米宽的石板上，水流经过这块不足一米的石板后，便钻进了厚得不能再厚的积雪下面，那里黑洞洞的，深不可测，一旦跌进去，只有死路一条。摆在大家面前的是一条一米来宽、4米多长的水路，水深近半米，流速很快。水路的右侧是陡峭的雪坡和小瀑布，左侧是一眼望不到边的积雪和溪水流入的雪下巨大黑洞，如同小雨般的雾霭在空中飘洒，流水的轰鸣让人感到震颤。为了保证安全，大家紧贴着水路的右侧踉走，此时，你才能体会到什么是“水凉刺骨”。李伟前面的冯蒂凯科长，蹒到中间时，突然身体向右一转，双手扶着水中的石壁，回过头

■行走

铜鼓笔记

□李骏虎



中国作协采访团参观铜鼓秋收起义阅兵广场

配备鸟铳、梭镖、大刀等低等武器的农民自卫队。这一阶段的农民武装，虽然隶属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会组织，但还没有任何的军队性质，它是革命的，但还不属于真正的革命武装，还不能称为“农军”，而此时正值国共合作期间，农民运动虽然风起云涌，但它还没有明确的政权诉求，农会斗争的目的不过是“减租减息”，斗争的对象也不过是地主土豪。就像陈忠实长篇小说《白鹿原》里写到的鹿兆鹏和黑娃领导的农民斗争那样，也就是斗地主、砸祠堂、分田地。

历史的转折点在孙中山的去世。

“壮志未酬身先死”，孙中山去世后，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公开叛变革命，从中央到地方的“清党”运动开始，大肆捕杀共产党人，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大革命失败。国民党省、县两级政府动用军队武装“清乡”、“铲共”，地主豪绅阶层也开始组织武装力量镇压农会，白色恐怖笼罩了城乡。在革命形势急剧恶化的情况下，中共基层党组织开始组建工农武装以适应新的斗争形势。以中共浏阳县委为例，将农民自卫军和县工会的工人纠察队合编为浏阳工农义勇队，配置了总队长、党代表、参谋长等军政领导，编制为3个大队、9个中队，770多人枪，成为一支共产党领导下的军事化力量。这就是那支没能赶上南昌起义的“浏阳农军”。与浏阳工农义勇队相似的是，“马日事变”后，中共平江县委把县团防局、农民自卫军、工人纠察队合编为平江工农义勇队，共计1200余人。在当时中共还没有自己的军队的情况下，这两支革命武装引起了中共中央和中共湖南省委的高度关注，先是在1927年7月派人将

浏阳、平江两支工农义勇队改编为中国国民党湖南工农义勇军第一路第四团队，拉到湘赣边界去打游击，接着又指示将这两支农军合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贺龙部)独立团，开赴江西参加南昌起义。

在军事改编中凸显“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是因为当时的中共中央受“右倾”路线和退让政策的思想左右，还停留在让革命武装寻求“灰色保护”的阶段，直到南昌起义后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率先提出“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枪杆子中取得的”著名论断，并提出“应立刻坚决地竖红旗”，才在领导秋收起义时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正式脱离国民党，开始了中共独立领导的工农武装斗争。

二

大革命失败后，虽然周恩来、朱德、贺龙领导了南昌武装起义，中共中央也在紧急召开的“八七会议”上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确立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和实行土地革命的总方针，把领导湘鄂赣粤四省农民秋收暴动作为会后全党的主要任务，但当时的中共中央还是把土地革命的主要力量放在农民运动上，对于秋收暴动中的武装力量没有足够的重视。只有刚在会议上当选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毛泽东认识到了建立革命武装的重要性。会后毛泽东回到长沙策划秋收暴动，在改组后的中共湖南省委会议上，毛泽东再次强调：“秋收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有一个军事帮助，否则暴动难免失败。暴动发展是要夺取政权，没有武装

来对李伟喊道：“老李，不好，路怎么动起来啦？”李伟估计他是产生了错觉，于是向他喊道：“没事儿，别看路，往前看，再走几步就上岸啦！”可是他却听不进李伟的话，死死站在原地，一动不动。李伟向前面已经上岸的人呼喊，可“哗哗”的水声把他的喊声全都吞没了，他又不敢从左边超过去，因为那太危险了。只能站在冯科长的后面，在刺骨的雪水中浸泡着，等待着被人发觉。大约过了一分多钟，已经过了河的冉科长偶然回头，发现这两位还停留在水中，于是立刻返身赶过来，向冯蒂凯伸出一根棍子。在冉科长和李伟的推挽下，冯蒂凯终于过了河，李伟也从紧张焦急中得到了解脱。

过了小河，接着就开始爬冰大板。说是冰大板，其实仍然还是雪，只不过是阳光的照耀下，表面一层雪融化后又结成了冰块。这个地方的坡度较大，足有60~70°，冉科长在最前面，使军用锹在坡上挖出交错脚窝，大家踩着脚窝，全身伏在雪地上，四肢并用地向上爬。李伟殿后，由于前面多人的踩踏，他脚下的雪窝已有些平滑了。而他最担心的是，前面的人万一失手滑下来，立刻就会产生连锁反应，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倒下了，其他的一个也跑不了。这支队伍在多雄拉山口南坡的冰板上，艰难地向上爬行着。爬了一多半的时候，李伟的一只脚突然蹬滑了，他顿时全身一紧，双手死死地扣住雪地，连下巴都用上了，好在止住了滑动。他拼命用脚尖又踢出个雪窝来，凭感觉确认自己已经站稳当了，这才放了心。他下意识地低头望了一眼，立刻感到后背冰凉，吓出了一身冷汗：这要是滑下去，再顺水流入那几十米深的雪层之下，就算没死也永远不会被发现。哎，这两条腿上的肌肉沉重也开始抖动起来了？他竭力想控制住两条腿，不让它们抖动，但就是不起作用，他第一次体会到了生理意义上的身不由己。他只好趴在雪地上，让过于紧张的身体慢慢地松弛下来，否则他就将寸步难行了。他与前面的同志间的距离拉大了，他看到上面有人向他招手，示意他跟上来，他只能无奈地摇了摇头。停了那么一会儿，大腿的抖动总算慢慢停止了，他才开始继续向上攀爬。

经过5个多小时的生死拼搏，李伟和他的战友们终于一个不缺地到达了多雄拉山口。当迎接他们的军分区战士从李伟肩上摘下半自动步枪时，他深深地呼出了一口气，感觉轻松多了，心里感叹道：天公啊，你再怎么厉害，也阻挡不了我们，我们还是胜利了！时任陆航二团机务处长的罗国富，一头扑进李伟的怀里，孩子似的痛哭流涕，嘴里则反复叨念：“我们活了，我们都还活着！”李伟的肩头和胸前抹满了这个30多岁的汉子流下的鼻涕和眼泪。

站立在多雄拉山口的峰巅，望着白雪皑皑、耸入云霄的雪

的护卫去夺权是自欺欺人的话。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寻找暴动的武装力量，成为毛泽东心中的头等大事。

就在毛泽东对革命武装望眼欲穿的时候，湖南省委接到中共安源市委关于浏阳工农义勇队和平江工农义勇队进驻赣西铜鼓、修水两县休整的报告，这两支农军之外，驻修水的还有同样没赶上南昌起义的一支中共领导的起义部队武汉警卫团，另外安源市委也有一支由工人纠察队、矿警队、农民自卫队组合而成的2000人的武装力量，毛泽东喜出望外，决定把这几支武装力量组合成一支军队，通过秋收起义开始武装斗争新指示。8月30日召开的中共湖南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决定将上述几支革命武装编成一个师，由毛泽东当师长，并组建前敌委员会领导秋收起义。第二天，心情急迫的毛泽东就把妻子杨开慧送回了老家，自己化装成商人，拖着病体乘火车去了安源，随行护送到的有毛泽民和安源市委委员宁迪卿。

毛泽东到达安源，随即主持召开了安源军事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所有工农自卫军可改为工农革命军”的指示，决定将浏阳农军、平江农军、武汉警卫团和安源的工农武装力量统一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下设三个团，并确定了标有红五星、镰刀、斧头图案的军旗。毛泽东就是要让中国共产党“立刻坚决地竖起红旗”，脱离国民党，独立地领导工农武装斗争。会后毛泽东亲自指导将安源的工农武装力量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然后在参会的浏阳县委书记、浏阳工农义勇队负责人潘心源陪同下，化装成安源煤矿的采购员，匆匆奔赴铜鼓寻找革命武装。

铜鼓县，位于湘鄂赣三省交界，是赣西门户。县境内九岭逶迤，沟壑纵横，是横亘于武汉、南昌、长沙三大省会城市之间的天然屏障，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自清末太平天国运动，直至辛亥革命、大革命，铜鼓人民都积极响应，尤其大革命期间的工农运动高潮迭起，党组织也得到迅速的发展健全，因此革命基础扎实，军事地位重要，在毛泽东的设想中，要将驻修水的武汉警卫团和平江工农义勇军调往铜鼓，与驻铜鼓的浏阳工农义勇队合编后，作为秋收起义部队的主力军进攻长沙。把铜鼓作为秋收起义的指挥中心，是毛泽东对铜鼓的地理位置和革命基础进行过细致研究和深思熟虑后作出的选择，也是结合当时斗争形势的实际情况作出的决策。

安源到铜鼓，山重水复、道路崎岖，湖南当局白色恐怖正炽，到处设卡缉查，遍地都是搜捕共产党人的反动武装，中共湖南省委虽然精心策划了护送毛泽东的人员和方式，毛泽东还是在浏阳、铜鼓交界的张家坊被捕了，他们被从深山里的七溪涧押往团防局处决。

毛泽东一生要紧赶紧逃脱去铜鼓组织军队，但直到距离国防总部不到200米的地方，他才把借来的几十块银元抛撒出去，趁着团丁捡钱，抽身奔向田野，钻入又高又密的茅草当中去了。

三

铜鼓古称麻羊洞，城东郊有巨石，色如铜形

峰和盘旋在头顶上的几只矫健的雄鹰，李伟的胸中翻涌起一阵骄傲自豪的热流，情不自禁想起了当年爬雪山、过草地、抢渡大渡河、翻越腊子口的中国工农红军。而今，李伟和他的战友们为了完成肩负的使命，两次奔赴西藏，爬雪山、蹬雪水、过险河、战严寒，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完成了党交给他们的光荣使命。他们经历的一切，是新的历史条件下一次新的长征，也是他们个人的历史上分外富有光彩的一页。

搜寻工作的完成只是善后工作的开始，临时掩埋在雪地里烈士遗骸需要及时处理。按照藏民的习俗，殡葬的方式主要是天葬、水葬和树葬，没有火葬这一说，所以当地也就没有火化的设备。

首长们研究决定：4位遇难烈士的遗骸在现场就地火化。综合权衡了各种条件后，领导自然又把这个工作交给李伟去牵头完成。这样的事情，谁也没经历过，更别说什么经验了。李伟只好和几个年长一点的同志，按照想象中的需求，提出了完成火化任务所需要的物品单子：一块钢板，一堆劈柴，两把铁锹，一支铁钩，一只油桶和4只听装压缩饼干桶。军分区的后勤部门立刻就东西置备齐全了。

直升机的载重曹天臣将军、王德荣司令员和参加执行任务的几个同志降落在事故现场，卸下了必需的物品后，李伟和罗国富处长以及一位姓袁的军医，留在现场执行火化任务。其余的人，随直升机飞离现场，降落在200米以外的河滩上，等候火化工作的完成。

李伟和罗国富在河滩上用大块卵石将铁板架起来，把用煤油浸泡过的劈材架在铁板下点燃，再把干干净净的白雪放在铁板上融化，用雪水把铁板洗刷干净。铁板慢慢地烧红了，李伟和罗国富把在此之前掩埋在雪地中的烈士遗骸小心翼翼地挖出来，再分别轻摊放在火红的铁板上，在高温下面，这血肉之躯开始化作缕缕青烟，随风飘散在喜马拉雅山中……

两个半小时以后，4位烈士遗骸火化完毕。李伟对4个铁罐进行高温烘烤后，把4个人的骨灰分别掺入其中，再把骨灰罐封装在一个纸瓶内。最后，李伟双手捧着4位烈士的骨灰，迈着沉重的步伐，登上了直升机。

在林芝，没有寄存骨灰的地方，李伟便把四罐骨灰安放在自己的床下。从林芝飞到拉萨，再从拉萨飞到成都，这4位烈士的骨灰都携带在李伟的行李箱中。参加完在成都举行的张荣海、巴古、刘家强、谭孝德4位烈士的追悼会，李伟才随首长以及相关的同志，一同返回了北京。

多年以后，陆航二团的老同志们，每每念及此事，对李伟所做的一切无不为之感动，都交口称赞：“老李真够意思，真能为基层部队干实事啊”！



似鼓，击之有金声。晋许旌阳斩蛟治水，迫孽龙于此处不见，许真人疑藏于石中，挥剑裂石，有一金鸡飞出，留下“铜鼓打不响，金鸡飞上天”的传说。毛泽东历经艰辛，九死一生，为了组建一支中共领导的革命军队，暴动起义夺取政权。当他终于来到铜鼓县，衣衫褴褛地出现在浏阳工农义勇队的指挥部萧家祠门口，这支缺乏政治思想建设的农民武装正处在前路迷惘、莫衷一是的境地之中，更重要的是，与之前的湖南常委扩大会议、安源军事会议的设想出现了大的变化，驻修水的武汉警卫团和平江工农义勇队、驻铜鼓的浏阳工农义勇队已经根据中共江西省委的指示，改编为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派人将花名册和经费预算书送到南昌，请求国民政府江西省主席和第五路军总指挥朱培德收编并拨给给养，这是利用朱培德和蒋介石的不和制定的发展策略，也是在为革命武装寻求“灰色保护”。师长由武汉警卫团副团长余洒度担任，下辖三个团，第二团空编。

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活的灵魂是：对具体情况做具体分析。毛泽东根据实际情况，为保证起义时间，改变原定计划，自己不再出任师长，把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师，师部领导成员不变，只将原定安源工农武装改编的第三团番号改为空编的第二团，顺利完成了中共领导的第一支工农革命武装的组建。同时组建了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正副师长、参谋长、各团团长为委员。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活的灵魂是：对具体情况做具体分析。毛泽东根据实际情况，为保证起义时间，改变原定计划，自己不再出任师长，把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师，师部领导成员不变，只将原定安源工农武装改编的第三团番号改为空编的第二团，顺利完成了中共领导的第一支工农革命武装的组建。同时组建了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正副师长、参谋长、各团团长为委员。

军事改编完成后，按照安源军事会议的决定，秋收起义将于9月11日发动，18日进攻长沙。革命的暴风雨骤雨即将到来的前夜，皓月当空，毛泽东心潮澎湃，诗兴大发，在指挥部萧家祠写下了《西江月·秋收起义》：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

修铜一带不停留，要向平浏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

秋收时节暮云沉，霹雳一声暴动。

和他之后许多文采飞扬的诗词作品比较，这首词直白如口语，但它的精神指向和革命思想却鲜明有力，有如一声惊雷作响，开始了中共独立领导军队、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阶段。毛泽东一生靠写文章来思考和指挥革命，进行军事和政治斗争，这首写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军事题材词作，可以称为开山之作，是战歌，也是散文，它标志着毛泽东“须知政权是枪杆子里取得的”“秋收起义非军事不可”“应立刻坚决地竖起红旗”等著名论断得到实践。

90年后的今天，当我站在铜鼓县双江口秋收起义阅兵广场，仰望看工农兵高举军旗昂扬前进的雕塑，怀想1927年9月11日凌晨，就在这个双江交汇的沙洲上，驻铜鼓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打出工农革命军第一面军旗，接受毛泽东的检阅后，暴动起义，誓师开拔，从此踏上中共武装夺取政权、推翻旧中国建立新社会的漫漫征程。之后，这支经过毛泽东“三湾改编”后焕发思想力量的工农武装，与朱德领导的南昌起义的部队在井冈山会师，成为人民军队建设初期的主要军事力量。